

“中國”專名考

施存龍*

“中國”名源問題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問題。“中國”一詞的涵義，粗看似乎是常識問題，然而，“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時即使在同一時期，在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中使用，其涵義也各有不同。

本文分為六部分：一是探討“中國”一詞由來，否定始於堯舜時說，考得最早見於距今三千年前西周遺篇反映將商代稱為“中國”；二是舉各種文獻實例分析“中國”一名在先秦時期有五種不同涵義的應用和演變；三是在指出秦代中國統一之後，着重論證從漢代開國初，就以“中國”稱全國領土、人口、中央政權的情況；四是論證漢以後國家統一時期的唐、宋、元、明、清各代以“中國”稱全國的史實；五是指出漢以後，處於割據、分裂時期對“中國”一詞的特殊應用，以及個別作者仍有把“中國”當作中原、內地等舊概念使用的殘餘現象；六是附帶介紹中國古今別稱。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點。

“中國”概念由來及其最早應用

一、“中國”之名并非堯舜時就有

從先秦遺存的古籍中，最早見有“中國”二字當稱《孟子》的〈萬章〉篇。該篇講夏代以前的舜事蹟，說堯不把帝位傳給兒子，而傳給賢能的舜，舜不肯又讓給堯的兒子去當，而諸侯不擁護不賢能的堯之子而擁戴舜，於是舜才從避位的外地回來，“之中國，踐天子位焉。”⁽¹⁾是否由此可以證明在舜時就有“中國”名稱了呢？我認為絕不可能。因為堯舜祇是傳說人物，即使實有其人，由於當時尚未出現國家，祇是個大部落或部落聯盟而已。《孟子》是距堯舜時代約二千年的後人根據傳說（當時尚未出現文字記載）而寫的書，不免用二千年後的春秋戰國時人的眼光和習用政治名詞“中國”、“天子”等套在距其二千年前原始社會的傳說上，所以不足信。有今人把這個“中國”解釋為京都，按《孟子》文意說得過去，按史實卻講不通。道理很簡單，舜時既然

尚未有國家，就不可能有“天子”、“天子”是周代才出現的，舜充其量不過是黃河中游一帶部落聯盟的領袖而已。既然尚不存在“天子”、“帝”，也就無所謂“京都”，不過是部落聯盟中心罷了。

據當代考古成就證明，中華民族祖先成立第一個國家，是治水專家大禹兒子夏啟所建的夏王朝，距今三千多年。⁽²⁾祇有到夏啟時有了國的實體，才談得上有“國”，進而有“中國”的概念產生。

二、最早有“中國”觀念的是商代，最早記其名的是西周文獻。

我們說“中國”觀念起源於商代，是以殷墟出土甲骨文卜辭中“土”、“方”、“或”的演變，和東南西北中五方觀念的關係研究而得的。

正如甲骨文專家葉玉森所說：“殷人稱國曰方，如土方、馬方、羊方、井方、盈方、苦方等的國名。卜辭言‘告方出’，即言某國出寇告於列祖也。”卜辭中所謂“四土”、“四方”是與自認為自己居於“中土”、“中方”的商直轄統治區對應而形成的。如“四方受禾”的“四方”是對商的“大邑”

*施存龍，中國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或 𠄎 𠄎

王襄

「古國字，省口，宗周鐘國作或亦省口。或字重大。」（類纂正編第六第三十葉上）

王襄

「古或字，國字重文。」（類纂正編第十二第五十六葉上）

孫海波

「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又前一，一地也。海波按，从口从戈，國不顯，加一則更明，許說殊迂迴。卜辭作𠄎，（前二·六·五）或，（後下三·八·六）𠄎，（後下三·九·六）并從戈口，蓋口象都邑之形，从戈以守國之義也。知口象城形者，國古皆訓

城；周禮士師：「三曰國禁。」禮記曲禮：「入國而問俗，曰：『國禁，城中也。』又周禮司士：「掌國中之士治，曰：『注曰國中，城中也。』考工記匠人：「國中九經九緯，曰：『注曰國中，城郭中也。』荀子致仕：「曰：『惠此中國，曰：『注曰中國，京師也。』」由是言之，則國即城也。卜辭从口，象城郭之形，从戈有戍守之義。金文作或（宗周鼎），或（毛公鼎），加一者，餘婦文也。小篆仍之，遂成今體。吳大澂古籀補云：「从戈守口，象城外垣，口於義頗近。系傳臣鑑曰：『口音圍，曰失之。』」（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六十頁）

孫海波

「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國之義也。古國皆訓城。」（考古三期六十葉）

洪家義 「甲骨文还有一个或字，學者或釋為國，但于日形則解釋不一，或以為表示城牆，或以為表示人口。其實曰是宗廟的标志，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口象征祭祀，戈象征兵戎，或字正好体现了這兩件大事。」（古文文字札記，文物研究六四——六五頁）

李孝定

「說文：國，邦也，从口从或。契文不从口。或字重文。或字从戈从口，口即口字，象有土也。戈字即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即國之古文。後假為語辭之或，乃後增口為偏旁耳。國下段注云：『戈部曰：或，邦也。』古或國同用。或國皆訓邦，知古或國同字，非僅同用也。金文作或（毛公鼎）或（王孫鐘）或（國差鐘）或（末距得）或（散整鼎）或（自武）或（齊侯鐘）或（從土，知城國亦通用也。拾遺十九有口字，辭云：貞口下上若。葉玉森謂：口疑國之古文。見拾遺二二葉非是。」（集釋二一一一葉）

李孝定 「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也。地也。域或又从土。契文多从口，或亦从口。此二形於偏旁中每混用無別。口，象城形，孫說是也。古國訓城，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然之詞，師案蓋除齊樽外，餘均為邦國字。」（集釋二一一一、三三七三葉）

田倩君 「𠄎這便是國字的初文，其右邊的𠄎（𠄎解）是兵器，取其意亦取其聲，左邊的口，是土地，取其形亦取其意。這個口是來自邑字的上部。……這便是后来甲骨文文中𠄎字的構造。（國字的演變，中國文字一五〇頁至一五一頁）

的構造。（國字的演變，中國文字一五〇頁至一五一頁）

即首都而言，到帝乙帝辛（即殷紂王）卜辭“四方受年”則已進而對整個廣大的商統治區而言。而商甲骨文中又出現“或”即“國”字趨於代替“土”和“方”。反映在《尚書》的〈周書·康誥〉和青銅器上金文這一脈絡更為明顯。前者以“東土”、“東國”並用，而在青銅器銘文如宜侯矢（ce，古同側）簋（gui）、班簋等皆通用東或（鄭、國）。《詩經·韓奕》均用“國”。《詩經·蕩》便用“中國”稱商。《詩經》中〈民勞〉、〈嵩高〉以“中國”對應“四方”

現在能考到的“中國”一名，最早見之於距今將近三千年前後的周代文獻中。這些文獻稱被接管的前代即商殷王國為“中國”。如“上古之書”《尚書》，其中〈周書·梓材〉篇是西周武王滅亡殷商後輔政大臣周公的政策性講話。他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³⁾，意思是說上天既然把中國的臣民和疆土託付給先王（周文王）。這裡的“中國”，雖出於周公之口，但他所指的事情是說如何把接管過來的殷商王朝的臣民和故土治理好。又如反映周代民間呼聲記錄的詩歌《詩經》中的〈大雅·蕩〉，是詩人借前人周文王斥責殷紂王的話，指責西周厲王（前849-842）無道：“女（汝）怨恚（咆哮）於中國”（你對全國飛揚跋扈），“內憂（bì、憤怒）於中國”（全國人民積怒於胸）。⁽⁴⁾所以，儘管在遺存的《商書》中找不見“中國”一詞，此兩句中的“中國”，倖存於周代人的文獻中，周代人回溯記憶猶新的前代即商代時，明指為商王朝，由此可以認為，始記“中國”一詞的是西周，始被稱“中國”的是商代。為甚麼西周會承認商國為中國，並認為自己取替其統治地位後也代表中國呢？這與商王朝統治中心設在中原即今河南省境，而西周統治中心設在陝西中東部也還是黃河流域中游地區相關。

因此，我讚同范文瀾校長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所說：“《尚書·梓材篇》、《詩·大雅·蕩篇》稱商王國為中國。因為商王國在當時各小國中，政治經濟文化都被公認為唯一的中心國。《詩·大雅·民勞篇》稱宗周和遵守周禮（制度）的諸侯國為中國。東周時期北方諸侯自稱中國，稱楚、吳、越等南方國為蠻夷。楚、吳、越稱北方國為中國或上



宜侯矢簋銘
文(拓本)

釋文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王位于宜宗社南卿（向）。王令虞侯矢曰：『餘，侯于宜。錫盤鬯一卣，商鬻（瓊）一枚，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錫土：厥川（邗）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錫在宜王人□又七姓。錫奠七伯，厥卣□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宜侯矢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國。秦佔有宗周舊地，卻被中國諸侯看作戎狄。中國這一名稱，含有地區居中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意義則是指傳統文化的所在地。”⁽⁵⁾

該書在講周代地理學時還說：“西周到戰國，中國（西周初，中國是指黃河北商國，〈禹貢〉所謂冀州）的疆域繼續在擴大，凡華夏文化到達的地方，都稱為中國或海內，中國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⁶⁾

所以，我不太同意中國社科院陳可畏先生所論〈梓材〉和〈蕩〉所指的“中國”是指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⁷⁾

三、“中國”觀念的由來

廣東有位學者說：“先秦時期，包括我國華夏民族在內的世界許多古老民族或文明古國，在建構自己的文化系統時，也就是形成文化圈時，都不約

而同地把‘自我中心’定義為核心。中國、古巴比倫、古印度，都曾稱‘中國’；古埃及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甚至古代美洲三大古族（印加、瑪雅和阿茲特克人），都表明自己是‘世界中心’，（……）

所產生的效果是自我中心的錯幻。”不過，上述這些自命為“中國”的文明古國，並沒有堅持下來，沒有以此為本國的代稱。唯有我國以“中國”自稱三千多年，並且後未成為歷史上我國全國的代稱，以及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由於華夏族聚居於黃河中游，建國家於其地，便自以為居天下的中心，把周圍地區視為“四方”或“四夷”、“四海”，所以自稱為中國。

先秦時期“中國”一詞的多種涵義應用

一、在秦代以前，“中國”一詞並不專指一種概念，而是應用於多義，這就需要我們區別對待，否則難以理解或產生不應有的誤解。

“中國”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乃至不同作者，有不同涵義的應用。

一是作京都用。何尊銘文記載周成王五年四月誥命：“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意即要建都於天下的中心以統治民眾。上述《孟子·萬章》所謂“之中國”，孟子原意顯然是說“去京都”。因為他說舜為讓位給堯兒子，而離開政治中心，避到外地去，而這個外地仍在他們自己統治區內，並未遠走高飛，乃在廣義的“中國”之內。

二是西周時對周天子直接統治區的稱呼：如《詩經·大雅·民勞》說：“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⁸⁾漢代毛亨註釋為：“中國，京師也。”也就是指京都。筆者不完全同意，認為今人程俊英解說較貼切：“中國，指西周王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即王畿，因四方都有諸侯，故稱為中國。”⁽⁹⁾按王畿可以包括郊野，所以這裡所說的“中國”，已超出京都的範圍，但尚不包括諸侯國在內，因此並不能代表全國。

三是指包括某些諸侯國的東周國境。《四書·中庸》稱按其標準去做，“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¹⁰⁾今有人將此句譯析為“因此，聖人名滿中原，並傳播到化外的蠻荒之地。”⁽¹¹⁾我看未必貼切。按中原通常指今河南省和相鄰的陝西中東部、山西南部。而這裡教導如何當聖賢的人孔子本

◁ 宋版《尚書》載“中國”

（宋）蔡沈註《書經集傳》，世界書局影印本。

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己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為其所虐其命何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刑辟以戕虐人可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若作梓材既勤模斲惟其塗丹腹堅奇寄反腹屋郭反○稽治也敷苗廣去草棘也疆畔濶采色之名敷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模斲以喻制度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畝既堅茨丹腹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來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來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來近也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於先王之後王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疆土於先王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也德用明德也懌和悅也先王克受天命之也迷民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何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義之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齊經卷四

九四

身就不是中原人而是當時周疆土東北的魯國人，所以不會僅指中原地區，而是指包括魯、齊等諸侯國在內的“化內”，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文明地區。《史記·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封其后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¹²⁾按虞國指今山西平陸一帶，吳指今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地區。虞並非周天子的直接統治區，而是諸侯國。可見這個“中國”已包括某些親近的諸侯國。

《史記·吳太伯世家》又記：“夫差十四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越春秋》佚文：“吳越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掘江通淮。”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淮水》中說到吳越春秋時的歷史說：“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¹³⁾沒有把江南的吳國算作中國之內。故不能不理解為指中原中央及各分封國。

四是泛指中原地區或在該地區的中央政權。《詩經》中〈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夷交侵，中國微矣。”《莊子·田子方》：“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¹⁴⁾《韓非子·孤憤》：“夫越雖國富民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¹⁵⁾

《吳越春秋》記春秋時越王勾踐遷都琅邪後“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今人譯白為：“中原各國都怕它。”⁽¹⁶⁾這裡的“中國”，也應理解為指中原各國。因為，雖然勾踐是擁護中央政權周天子的：“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¹⁷⁾但在當時的觀念，認為吳越是偏遠之地，不算在“中國”之內。同時人穀梁赤所著《春秋》三傳之一的《穀梁傳》中，說到“昭公不在乾侯，中國不存公”，註曰：“中國，猶國中也。”⁽¹⁸⁾意思是說，昭公出走了，不在國內。

二、秦代趨向將“中國”用於指全國

《史記·天官書》提到秦代觀念：“及秦併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併中國，外攘四夷。”⁽¹⁹⁾意思是：到秦併吞六國時，黃河以南算是中國。中國的山川為東北走

向，它的維脈，頭在今甘肅、四川，尾在渤海、碣石一帶。秦國終於滅了六國，併吞周天子直轄區即所謂“中國”，向外攘除夷狄。有必要指出，前者所說的“中國山川”已指秦代統一時的全國領土，而後面所說“併中國”則是回顧併吞其它諸侯國，專指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滅掉掛名的周天子赧的直轄領地。⁽²⁰⁾這個領地王畿此時已被擠在韓國的三川郡（黃河、濟水、伊水之間）⁽²¹⁾即洛陽一小塊地方。

在《史記》中，對春秋時的“中國”，有時還往往指中原各國。如〈越王勾踐〉中三處用“中國”一詞：“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若把“中國”解釋成是指周天子，豈不與勾踐“尊周室”矛盾了嗎？所以是指中原各國，如山西的晉，山東的齊。又說越王“無強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此中“中國”也是指與中原諸國爭雄。最後太史公說越王勾踐“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意即既向北到中原各諸侯國耀武揚威，又能尊崇周朝王室。

“中國”成為全國專稱應始於漢初

當代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地理卷沒有列“中國”一詞，《中國文化史詞典》也未列。《漢語大詞典》列了，但祇介紹該詞的多種釋義，未涉及起源和何時開始代指全國。

上世紀30年代編寫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列有此詞並註釋其起源，卻很籠統含糊：“我國自稱之名，上古之時，建國於黃河流域，其四方均蠻夷戎狄，以己國在中，故稱中國，亦曰中華。”⁽²²⁾沒有說清楚“上古”何時，“建”的何國名？“黃河流域”範圍很大，指建在其中何處，均未回答。

當代大型工具書《辭海》的“中國”條釋文稱：“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始專指我國家全部領土，不作他用。”未說具體依據和情況。⁽²³⁾此提法，恐不符史實。不錯，19世紀中葉如道光時，林則徐〈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說：“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²⁴⁾這裡的“中國”無疑是代指

188

四國，入朝奏之。好，呼報翻。誘，音西。撰，士免翻。朝，直遙翻；下同。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敦煌，帝改瓜州爲敦煌郡。教，徒門翻。至于西海，此西海在條支西。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爲伊州。高昌，唐爲西州。鄯善，唐爲納縛波地。鄯，時戰翻。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將，即亮翻。驍，堅亮翻。汎濛汎而越崑崙，易如反掌。濛汎，蒙古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汎，祥里翻。崑，盧昆翻。易，以鼓翻。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吐，從敬入聲。朝，直遙翻。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渾、厥，謂吐谷渾、突厥也。使，疏吏翻。厥，九勿翻。夏，戶雅翻。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谷，音浴。易，弋鼓翻。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昭之以利，勸令入朝。復，扶又翻。昭，徒濫翻。又徒覽翻。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卒，子恤翻。皆矩之唱導也。

¹⁶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降，戶剛翻。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

王崇武標點容肇祖森森校

五六三五

以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³³⁾。這些話中的“中國”，對應的“匈奴”並非漢版圖內領土，而是敵對鄰國，所以有指全國之意。而〈繇役〉篇則更明顯是指全國：“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³⁴⁾不過，有時卻用來指內地。〈誅秦〉篇記大夫桑弘羊辯辭說：“中國與邊境猶肢體與腹心也。（……）侵暴中國，中國疾之。”⁽³⁵⁾〈地廣〉篇中論及：“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捍也。”故他主張：“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漢國邊境當然屬漢領土的一部分，這裡把“中國”與邊境對應論事，顯然意指內地。

西漢中期，曾與漢成帝當廷對話的楊雄〈交州箴〉稱：“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³⁶⁾把比廣東更遠的交州（在今越南北方）包括在“中國”的概念內。

由上面歷史文獻考證，我們可以肯定，至遲在公元前206年漢高祖時，已把全國國土和人口稱爲中國了。

東漢時，繼續主流以“中國”指全國。如《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在介紹大秦國時稱：“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以“中國”代稱整體中國人。

漢以後歷代統一國家均沿用中國代稱

一、隋代統一南北朝後，用“中國”泛指全國。

如北宋司馬光奉敕編纂的《資治通鑑》，在〈隋記〉四，煬帝大業三年記載，說到太常卿高穎對隋煬帝一意孤行、不接受他諫言而發表對國家的憂慮：“穎又以帝遇啟民〔施按：當時北方附歸中央皇朝的少數民族政權啟民可汗〕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同

《資治通鑑》反映隋代用“中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中《隋記》頁5635

方相當於今江蘇、安徽之間，並不是中原，故不足爲證。東越人所說的“中國”是指內地，自認爲自己是處於中國的邊遠，這或者是一種自卑之辭。

在《史記》之後編寫的，記錄漢武帝始元六年時討論當時內外政策朝政會議的桓寬〈鹽鐵論〉，首篇說：“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第二篇又說：“富國非一道，（……）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同書〈通有〉中云“今

年冬在講到掌管張掖邊境貿易的吏部侍郎裴矩，投煬帝所好，在他鼓勵下，“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在《隋記》五，大業五年，在介紹煬帝在邊境向集合的外國大擺闊氣時記載：“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帝復令(……)周互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

二、唐代以中國代稱全國已屬普遍現象

五代所寫的《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³⁷⁾“昆侖”本是地名，這裡代指該地人民名，泛指今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的人。此句指他們乘船到廣州港貿易，與他們交易的是中國南方的港口城市，即使不在廣州銷售，也不過到揚州等地脫手。那些商人罕有進西安交易的機會。所以這裡的“中國”顯然泛指整個大唐帝國國土。

宋歐陽修編著的《新唐書·陳子昂傳》中，敘述陳在向朝廷議政時，連用了七個“中國”。其中，勸朝廷不要固守糧食供應不上的長安，應遷都供應方便之地說：“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這個“中國”是指舜、禹當時直屬統治區的中國，限於中原。當他論及隋朝亂用民力招致困難時說：“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中國之難起。”這個“中國”則是指隋全國政權動搖，他建議執政者去禍根修仁德“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這個“中國”指唐朝全國。當他向當局陳言施加武力於邊疆外回紇族的危害時說：“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這個“中國”指全國中央政府。在陳言疆外不同少數民族間矛盾對唐帝國的利害關係時說：“夷、狄相攻，中國之福。”“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這裡兩個“中國”也指全國。祇有他在提醒當局要重視保住四川，不要圖羌時所言“蜀為(……)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³⁸⁾，其中“中國”似有狹指中央政權駐

地之意，因為此句意謂從四川調運糧食，由長江出來可以接濟京城，而四川(蜀)本是唐帝國全國的一部分。這種應用是極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一般。

唐代著名大臣韓愈〈上佛骨表〉奏章稱：“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傳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³⁹⁾指的是全國，並非像陳可畏先生所理解的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因為唐代並無皇帝直統區和諸侯國之分。有趣的是《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跟隨鑑真和尚東渡日本的唐僧祥彥在起初回答鑑真時說：“人身難得，中國難生。”⁽⁴⁰⁾可見唐時普通和尚也已稱大唐帝國全國為中國了。

南宋朱彧《萍洲可談》還追溯漢唐說：“漢威令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

明萬曆時，何喬遠在《閩書》中追述回教在唐朝的傳播史說：“穆罕默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中國：一賢傳廣州；二賢傳楊州；三賢、四賢傳泉州。”這裡把廣州、楊州、泉州全不屬中原的東南三地稱中國，又可見唐代是以中國稱全國。

三、宋代以“中國”稱大宋帝國，隨處可見。

《宋史·高麗傳》稱該國“風俗頗類中國，燃燈如中國上元節。”記元豐時陳睦從明州乘船到高麗時，“言尊順中國如天云”，當寫到宋朝派朝衍、孟健出使高麗回來匯報情況，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述及貨幣時：“地產銅不知鑄錢，中國所予錢，藏之府庫。”述及高麗音樂時：“賜樂乃分左右二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也。”⁽⁴¹⁾又如，宋人王禹偁《小畜集》：“占城(今越南北部)、大食(今阿拉伯)之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⁴²⁾外國船抵福州港就稱到中國，則此“中國”無疑指全國。程師孟詠廣州詩：“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猶見外夷情。”⁽⁴³⁾把華南的廣州港包括在“中國”之內，表明詩作者的地理觀是把宋全國視為中國。程在北宋不是尋常人，而是一個在地方和中央任要官的人物，歷任江西轉運使，先後任福州、廣州、越州行

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至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百七

七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

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并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驕以待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一百七

七

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懇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鐔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肅肅以西皆仰

政首長知州，在朝中光祿大夫任上去世。因此，他的用語基本上是代表官方的。南宋人編的宋代《輿地紀勝》：“番禺控引海外，諸國賈胡歲具大舶，資奇貨，涉巨浸，以輸中國。”把海外國家水運到番禺即今廣州，就認為是運到中國，可見此“中國”代表全中國。北宋的曾鞏，曾在元豐元年出任明州知州，執政期間聽到高麗商人崔舉來明州時在海上遇風暴翻船，漂流到泉州獲救後，是徒步押解到明州的。他為此給神宗皇帝寫了一份奏摺中說：“竊以海外蠻夷（……）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他在另一份建議拒收外國人送禮給地方官的奏狀中也說：“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⁴⁴⁾兩奏中所稱的“中國”都無疑是指北宋全國。

《宋史·岳飛傳》引述岳飛上疏中言論：“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⁴⁵⁾把金國統治者利用其在江南代理人打中原稱為“中國攻中國”，可見他也是以中國代表宋統區全國的。

《宋史·河渠志》開頭就說：“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後面講到黃河流經：“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前一個“中國”指歷史中國，而後兩個“中國”，則指大宋帝國的自稱，因當時黃河上源在“吐蕃諸部”東北部，即今青海省，自蘭州進入西夏（今內蒙），然後折入宋境北部（今陝、晉、豫三省）。在宋人轄境觀念中，認為西夏東部統治區、華北各路被遼、金侵佔區，本乃大宋國土，所以認為是黃河進入中國；而對處於分散混亂的以今西藏為主包括今四川西北、青海的“吐蕃諸部”視作非大宋帝國直統區。

四、元代亦稱元帝國領土為中國。如元至正十年（1350）張翥為汪大淵《禹夷志略》寫序，第一句話稱“中國之外，四海維之”。元末人寫海商出國，稱“凡東西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福建航海者“至彼者，如東西家然”。⁽⁴⁶⁾《元史·鐵木兒塔識傳》：“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

可令睹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之向化。’”⁽⁴⁷⁾這位大元帝國當權人之一的鐵木兒在表明對待日本國情報人員來偵察元朝國情態度時，就以“中國”一詞代稱整個國家。

五、明代從始至終以“中國”指全國。

最有代表性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在南京奉天門召集群臣鄭重宣言中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明太祖實錄》卷六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在彙編他的言論錄《皇明祖訓》中稱：“彼即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皇明祖訓，祖訓首章》。）洪武元年（1368）十三月，朱元璋給高麗國王的璽書中說：“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昔我中國之君……蓋慕中國之風……”（《明太祖實錄》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⁴⁸⁾明太祖這一篇對內部高級幹部講話，一篇留作子孫遺訓，一篇作對外國書，不但把他新成立的大明帝國全國，而且把以前歷代政府都稱為“中國”。他建都於遠離中原的長江南岸的應天府為南京，故無指中原之嫌。

洪武以後各朝，在一般人員中用“中國”概稱大明全國也見普及。如永樂朝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其名著《瀛涯勝覽》稱古里國“去中國十萬餘里”。⁽⁴⁹⁾宣德五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在他《西洋番國志·占城國》裡連用五個“中國”：“其狀與中國雜戲中粧粉者所戴冠同”，“氣候常煖，如中國四五月時”，“波羅蜜……子，大如中國刀豆子”，當地人“所喜中國青瓷”，“赴中國進貢”。同書〈爪哇國〉篇用“中國”達九個，如“中國銅錢通使”，“中國廣東及漳州人多逃於此”，“蘇兒把牙……也有中國人”，“升·名曰姑刺，該中國一升八合”等等。⁽⁵⁰⁾正德朝《明武宗實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記錄：“海外佛郎機，前此未通中國。”嘉靖朝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寫：“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佛郎機銃大，中國人用之。”⁽⁵¹⁾親臨過澳門的葉權，在嘉靖四十四年

〈賢博篇〉寫：“舍船而屋居岸上，夷性變詐……知中國長短。”他們用“中國”敘述發生在珠江口東莞縣和澳門的事，與中原無關，表明這些官員行文皆以“中國”代稱整個大明國的領土和政權。萬曆朝人羅懋登《西洋記》自序中也寫“夷且為中國梗”等。⁽⁵²⁾

明朝全國政權滅亡後，南明殘餘勢力與歐洲人辦外交，仍不忘用“中國”代表固有領土。例如南明永歷十二年(1661)三月，鄭成功率兵向被荷蘭人盤踞的臺灣地區進軍，先泊澎湖列島，後克臺灣本島赤嵌城。荷人退保另一港口熱蘭遮。鄭又大敗荷軍，於四月二十六日向荷殖民主義者發出勸降書稱：“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而貴國所踞。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⁵³⁾永歷十六年，寧波著名學者朱舜水流亡日本。他批評大國主義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⁵⁴⁾可見明亡後的外流遺民仍以“中國”概指歷代傳統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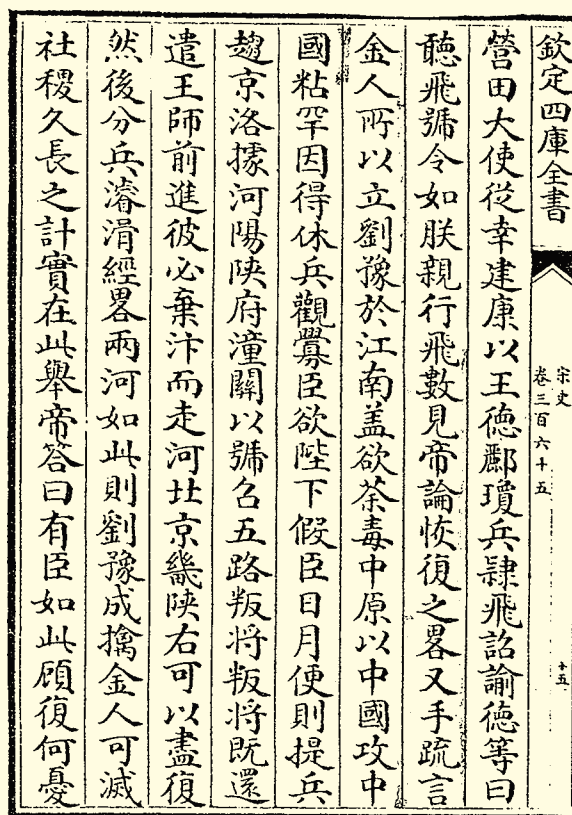
六、清代雖以東北少數民族統治全國，國號“大清國”，且立統治中心於非中原地區的京師(北京)，但也以中國自居，繼續簡稱中國。清初康熙二十八年與俄國簽訂的《尼布楚界約》就處處用“中國”，開篇就是“中國大皇帝欽差”。約中稱：“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黑龍江大小諸川，應歸中國管轄”，“俄民之中國”。又如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圖界約》，內稱“中國大臣”、“中國蒙古卡倫鄂博”等。⁽⁵⁵⁾

清末，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奏狀中稱：“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他建議朝廷派北京部隊到江蘇省沿海學製外國武器，在〈京營弁兵到蘇學製外洋火器摺〉中說：“蘇松太道〔施按：指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行政區，道衙門駐上海，故實際是指上海〕丁日昌之局〔指丁日昌領導的機械廠〕皆不僱洋人，但選中國工匠，倣照外洋做法。”曾在馬禮遜學堂學習的近代第一個美國留學生容闓，在自述中說他於1863年11月到安慶見曾國藩時，“請於中國設一西式機器廠。……”⁽⁵⁶⁾

以上可見，從清初到清末，從朝廷外交文件到內部政務和學者論事，均通用“中國”。

當我國處於分裂割據時期 “中國”涵義的特殊使用和復舊

一、“中國”往往被割據勢力或殘餘政權自詡為代表全國傳統政權的代表。當晉以後我國分裂為南北朝時，北朝自稱為“中國”。如後魏人楊街之《洛陽伽藍記》稱在洛陽城內，“(……)自葱嶺以西至於秦(……)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他們把南朝貶稱為“島夷”。而在江南建都的南朝也自稱“中國”，貶稱北朝為“索虜”、“魏虜”。⁽⁵⁷⁾彼此不承認對方為“中國”。當宋、遼對峙時，雙方也都自稱“中國”。侵佔北宋北部半壁江山的金國朝廷自稱“中國”，可從已遷都在河南開封的皇帝金海陵的嫡母徒單太后的言論中獲證。她



▷ 明代稱“中國”：《宋史·岳飛傳》

說：“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金史·后妃傳》）這種可笑情況，當代從大陸敗走臺灣的殘餘勢力仍有變相的重演，如宣稱“中華民國在臺灣”，又主張有“兩個中國”，說甚麼“臺灣是一個中國，大陸是一個中國”云云，這都是分裂祖國統一的謬論。過去，有的偽政權如汪偽自稱中國，則不僅可笑而且可恥了。

二、國家分裂時期出現返指中原政權現象

當東漢分立三國，“中國”指中原地區即今河南省一帶。如《三國志·諸葛亮傳》敘述諸葛亮勸孫權執行納劉備而抗曹操政策時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⁵⁸⁾同書《孫策傳》記孫策臨死前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這裡都把吳越即今江浙兩省之地不包括在“中國”之內，顯然這個“中國”僅指曹操把持的漢獻帝當傀儡的中原地區。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記周論分析曹操兵力，說曹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⁵⁹⁾這裡兩個“中國”均指中原。《晉書·宣帝紀》回顧三國史事說：“孟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這個“中國”明顯指立國於黃河中下游的三國之一魏國而言。⁽⁶⁰⁾同《紀》又說：“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吳。”⁽⁶¹⁾這裡的“中國”則指中原地區的人。

晉以後分裂為南北朝時，“中國”又被用來指中原地區。如南朝宋時，劉義慶《世說新語·語言》中說：“江右地促，不如中國。”⁽⁶²⁾按“江右”即江東，指長江下游以東地區。在全國統一時期，長江下游當然是包括在廣義的中國之內。但這裡的“中國”顯然指北朝所據的中原地區，意思是說長江下游以東地區不如中原地區寬廣。

唐亡分裂為五代十國時，也出現同類情況，“中國”一詞又從指全國變成僅指中原政權。如割據兩浙的吳越王錢鏐受梁代封。《舊五代史》稱：“吳越錢鏐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⁶³⁾《十國春秋·補遺》：“梁時，江淮道梗，吳越泛海通中國，於是沿海置博易

務，聽南北貿易。”⁽⁶⁴⁾這裡，用“中國”來代稱對錢鏐具有宗主地位的居於中原地區的梁朝廷。吳越國歸宋後，宋朝皇帝回憶往事時也仍如此認為。如宋神宗給發運使薛向手詔中道：“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錢（指錢鏐）、劉（南漢國主劉鋹）者，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這裡的“中國”顯指中原政權。當然我們不必諱言，在統一時期也有個別情況下仍使用“中國”來指中原地區的，如《漢書·地理志》載：“粵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皆粵界也。（……）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矣。”按班固兄妹編寫《漢書》時，南越（粵）上述各郡都早已納入漢帝國版圖，也就是漢全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所以，這裡的“中國”，顯然仍狹指中原地區的商人。但此情況祇可說明其為支流，乃先秦時不同用法的殘遺，主流則是從漢代起之歷代都沿用“中國”代表各代所統治的全國國土或全國合法政權。

對“中國”一詞，除最簡單地理解和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詞外，在必須斟酌的場合下，如何理解得更好，使用得更貼切，筆者以為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另一段話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中國”當作祖國：“中國這一名稱，早在西周初年，已經用以稱呼華夏族所居住的地區。從歷史記載看來，秦以前，華夏族稱它的祖國為中國（如《左傳》成公七年，季文子說‘中國不振旅’，中國是華夏各國的總稱）；秦以後，中國擴大為當時國境內各族所共稱的祖國。所以中國這一名詞的涵義就是祖國，朝代則是統治階級在各個不同時期所建立的國家的稱號。中國為各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所共有，但以大多數居民即勞動人民為主體，朝代則為某一族主要是漢族統治階級所獨有，以君主（王或皇帝）和他們的朝廷（政府）為首領，朝代有興有亡，一個替代一個，中國本身則總是存在着並且發展着。”“國家建立在祖國的土地和被壓迫階級上面。代表國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在表面上似乎是站在社會之上。（……）在這種情況下，祖國、國家、君主三者常混為同一的事物，（……）區別不清

楚。不過，由於兩大階級性質的不同，在表現愛國思想的具體行動中，自然要顯出它們不同的愛國表現。”他接着還分析衰朽朝代和殘暴君王時的忠君愛國、農民起義的愛國、從統治階級分離出來的參加起義者的愛國，以及在反抗外族侵略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愛國行動，如何享有愛國主義稱譽，等等，也值得我們參考。⁽⁶⁵⁾

中國國號和別稱

一、一代國號與歷代統稱乃是不同概念。我國歷代皇朝均未用“中國”作為正式國號，而是各有國號。如漢代正式國號為“漢”或“大漢”，唐代正式國號為“唐”和“大唐”。外國人稱那時的中國人為“漢人”和“唐人”而罕見稱“中國人”。其後多代稱大宋、大遼、大金、大元、大明、大清，也都不稱中國。有人說“真正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的簡稱，那是從辛亥革命後開始的。”我看不全面吧。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未見法定簡稱中國。不過中國一詞趨向正式作簡稱使用則是有的。如1919年11月民國政府與美國太平洋拓業公司借款合同中寫“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中國政府’）”。⁽⁶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般以有“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簡稱的共識。“中國大使館”、“國籍中國”、“中國政府”等等中的“中國”，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唯有與台灣當局內政糾紛中的“中國”自當別論，我們不承認“兩個中國”，卻允許“中國”可各自解釋。

二、中國的別稱、代稱

代表全部領土的中國名稱還有不少別稱。大約是戰國人假托夏禹的名義編寫的《禹貢》曾把全國劃分為九個州，所以後世相沿稱中國為“九州”。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示兒》詩中寫“但悲不見九州同”，為宋朝未能把南北統一而遺憾。清代愛國詩人龔自珍也有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⁶⁷⁾，均以“九州”代稱祖國。還有一個別稱是“赤縣神州”。它是戰國地理學家驩衍提出的。《史記·孟子、荀卿傳》：“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南朝《世說新語》寫東晉時幾個南遷建康即今南京的士人，在新亭遊宴，相視涕淚。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光復神州。”當代毛澤東詩詞也樂於用之，如大家熟知的“長夜難明赤縣天”，“六億神州盡舜堯”。⁽⁶⁸⁾除赤縣，神州，還有中華、中夏、華夏等等也往往代指中國。如晉代桓溫《請還都洛陽疏》：“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句中“中華”即代指中國。又如近代梁啟超《愛國歌》：“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⁶⁹⁾更明顯以“中華”稱中國。

春秋戰國時還有一種地理觀念，以為中國四周有海洋圍繞，因而又把中國國境內稱為“海內”，如孔子學生子夏勸人友好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⁷⁰⁾，就是說全中國的人都是同胞手足。《戰國策·秦一》把制服全國稱做“制海內”，把中國境外稱為“海外”⁽⁷¹⁾。唐代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名句⁽⁷²⁾，可見古人常以“海內”代指全中國。

外國人對中國也往往用別稱，最常見的有“支那”、“絲國”，還有“契丹”等。為何稱支那？說法不一。有以為古印度、希臘、羅馬等國稱我國為 China、Thin、Sinae 都是秦國的“秦”字對音；有以為古印度、波斯人稱我國為 Cina、Cini 等國，意為“產絲之國”，並非“秦”的音譯。漢以後傳入中國的佛經把中國譯作“支那”，“至那”和“脂那”等。公元一世紀末，埃及國亞歷山大港無名商人《厄立特里亞航行記》稱中國為 Thinai，音譯即“脂那國”，也就是“支那”。⁽⁷³⁾日本人從唐代到清代往往習稱中國為“唐國”，但近現代日本人改稱中國為支那，暗含玄機，把侵略中國部隊寫作“支那派遣軍”，把設立在北京宛平縣城“七七”事變中日談判地標誌為“日支事變”等，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稱我國為賽里斯國（Serice），意即“絲國”；稱中國都城為賽拉（Sera），意即絲城，當因我國古代出產絲綢運銷到歐洲之故。⁽⁷⁴⁾

歐洲人把中國稱為 China，該詞原意是瓷器⁽⁷⁵⁾，轉而引申為產瓷器的國家。中國為瓷器的發源地，原產國，明初傳至歐洲時，貴如黃金，以此聞名。

所以他們以 China 稱中國，在當時互相尚不夠瞭解的情況下，以代表性產品稱產地名，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可視其為一種意譯的別稱吧。

元代歐洲人又往往稱元代時期的中國為“契丹”（Cathay、Catayo）。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就是把中國當時北部即黃河以北稱為“契丹”省的。⁽⁷⁶⁾當時黃河流向與今不同，是經過今江蘇、徐州、邳縣、淮安入海的⁽⁷⁷⁾，所以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遼寧、河南北部、江蘇北部。而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以南稱為“蠻子省”。儘管中國人自己對“契丹”一詞是指從北魏居住在遼河流域的少數民族而言（唐末建立遼國，1125年被金國所滅）⁽⁷⁸⁾，而且元代行政區域也無“契丹省”之名。⁽⁷⁹⁾但該書問世後，歐洲人便以“契丹”稱中國了。俄國人和前蘇聯稱中國為 kŋTán，就是“契丹”音譯。⁽⁸⁰⁾這是他們當時不夠瞭解中國的歷史局限所致的反饋。在葡萄牙國王杜亞特的藏書室中，有兩部拉丁文《馬可·波羅遊記》抄本。1502年，該《遊記》在葡京里斯本以葡文出版，該書前言就寫：“想往東方的全部願望，都是來自想要前去中國。航向遙遠的印度洋，撥旺了對那片叫做中國（Synē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嚮往，那就是要尋訪契丹（Catayo）。”⁽⁸¹⁾哥倫布從西班牙西航，目標就是找“契丹”，當他抵達後來稱為“南美洲”的地方，就以為是到了“契丹”，把今古巴島國當作中國福建泉州一帶了。⁽⁸²⁾

“國”字起源及其涵義演變

探索“中國”來源應該聯繫到“國”字的起源及其涵義的演變。

一、甲骨文“國”字涵義

商代甲骨文中有一字，專家們認定就是“國”字，會意字。其涵義今人有兩種解釋：一是據其構造從戈從口，認為是以武力保衛人口。⁽⁸³⁾二是據其構造從戈從口（城），認為是以戈守衛城池。⁽⁸⁴⁾不論哪一種解釋，共同涵義都具有武力捍衛一定範圍

的群體，已經含有政權的意思。這種觀念的誕生應在史前，即最早成立國家的夏。

不過，收集在《尚書》中的幾篇〈商書〉，未見有“國”和“中國”的字詞，有的祇是“邦”“都”之類。如《尚書》中的〈商書·說命中〉有“建邦設都”之句。今人江灝註：“邦，指王國或邦國。王國，天子建立的國家。邦國，諸侯的封國。都，天子建立的帝都 and 諸侯建立的國都。”⁽⁸⁵⁾又如〈商書·微子〉篇中，朝中大官父師對商朝王子微子說“天毒降災荒殷邦”⁽⁸⁶⁾，〈武臣〉篇中有“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還不見稱“殷國”而稱“殷邦”。

商朝的統治區，一小部分歸商王直接統治，大部分則屬商王分封的區域，稱“方國”。按當時觀念，商是位於東南西北四方之中的國土。因此商朝實際上會有中央之國的地理觀念。到了西周，“國”不斷在《周書》出現，〈泰誓〉有“流毒下國”⁽⁸⁷⁾，〈洪範〉中有“凶於而國”⁽⁸⁸⁾，〈旅獒〉中有“伯叔之國”、“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等等。⁽⁸⁹⁾

二、“國”的不同概念應用演變

漢代《說文·口部》本義是邦國：“國，邦也。從口，從或。”⁽⁹⁰⁾最初演變，祇是當作都城，如說“三十一年還舊國”，意即指某年回到老都城。泛指地區，如說“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後演變為國家（家，先秦是指大夫統治的地區），如說“國家以民為本”。茲將先秦至唐代“國”的不同應用歸納如下：成書於戰國末期的《周禮》，其首篇〈天官〉的首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⁹¹⁾，兩個“國”字都指國都，也就是指天子的王城。又如漢代人附在《周禮》之後以代替佚失的《周禮》原篇〈冬官〉的《考工記》（清人考定）稱：“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⁹²⁾意即工匠營造都城，城圍長九里，每面三個門；以王宮為中心，築縱向道路和橫向道路各九條。戰國時，《韓非子·有度》稱：“燕襄王以河為界，以薊為國。”“河”指今北京琉璃河，“薊”指今北京市區廣安門一帶的薊城，原是薊國的都城。此時，燕國已併吞薊國，並遷都至薊城。以薊為國即指以薊城為首都。直到唐代，在文學作品中仍有用“國”字代稱首

都的，如皮日休諷刺丞相李德裕要江南官員把無錫的二泉水運往宋城長安烹茶：“丞相常思煮茗時，郡侯催發祇嫌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國”指的是長安城。“國”也作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如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封召公奭領地，今北京及河北省某些地方就稱為燕國。⁽⁹³⁾秦統一其它六個諸侯國後，原分封諸侯國撤消，祇有中央統一號令的秦國。西漢初，漢高祖又分封一些功臣為諸侯，其封地又稱國⁽⁹⁴⁾，如北京一帶有廣陽國，河北境內有中山國，山東有膠東國、魯國等等，與朝廷直屬的行政區郡，如涿郡、漁陽郡等并存⁽⁹⁵⁾，所以史稱郡國制。

後來在漢文化圈中的日本國也有同樣應用，其外交文書上寫“日本國”“日出國”中的“國”均代表全國，同時也把縣級行政區稱國。日本人寫的

《唐大和上東征傳》

寫作者隨同鑑真東渡日本實況，提到遣唐使大伴古麻呂的回國航路就寫到“第二舟着薩摩國阿多郡”。所謂薩摩國不過是日本國中一個小地方，即今日本鹿兒島川邊郡。同書還提到“三日，至河內國”，即今日本大阪市；提到“勅施備前國”，即今日本岡山縣。⁽⁹⁶⁾又第四次日本國遣唐使所謂回到肥前國，也不過是日本國境內一個小國，即今日本平戶島和五島列島地區。⁽⁹⁷⁾另據

《阿育王志》(寺在今寧波市鄞州區)載，宋代日本僧重源將周防國木材運到明州港助修該山阿育王寺舍利殿，周防國即今日山口縣⁽⁹⁸⁾，當時也是日本國中相當於一個縣級下屬的“國”。

三是當作政府或中央政府用。《周禮·春官·崇伯》中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意即以國家規定的喪禮，親臨執行禁令。⁽⁹⁹⁾又如《周禮·春官·詛咒》中所說的：“以敍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¹⁰⁰⁾，前面的“國”指周天子所在的王國政府，後面的“邦國”指諸侯國的政府，說的是中央政府要對地方政府先樹立信用的榜樣。《周禮·考工記》也作政府解：“國有六職，百官與居一焉。”⁽¹⁰¹⁾意思就是：政府有六種職責分工，百工是其中之一。不過同書對“國”也有作它義應用，〈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¹⁰²⁾其中“國”則表示“領

明太祖實錄 卷三七

二二

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
淮右布衣募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
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
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
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
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
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
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
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詔
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
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

談論而已○壬辰遣符寶郎傑斯奉書賜高麗國王王額曰
自爾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朝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發給高麗國的外交文件

0750

0749

土”，說的是國境內如果發生嚴重旱災，巫師的首領就要進行舞蹈祭神以祈雨。

詩詞中有的“國”往往無行政區劃涵義，如唐王維〈相思〉詩句“紅豆生南國”⁽¹⁰³⁾。今人陳毅〈梅嶺三章〉詩中有句云：“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¹⁰⁴⁾前一“國”字如王維那樣泛指南方，並無實體行政區。而後一“國”字則顯然泛指城垣，“國門”不見得指首都的城門，當時國民黨政府首都在南京城，在江西被俘不見得要押解到南京處死，以免途中被劫獄，更不能當作國家海陸邊疆的門戶解釋。

以上是我國對“國”字的不同應用，對外國也存在概念的不同運用。如《宋史》把高麗全國稱作國，又把首都也稱為“國”，對同一國字作兩解用。

我國古人對境外一個政權統治下的一塊領土單位，往往概稱其為“國”。如中國漢代初，日本尚未

形成統一國家，僅知今九州島一帶為“倭人國”。《漢書·地理志》稱：“東浪海〔施按：指今北黃海、朝鮮海峽〕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¹⁰⁵⁾《三國志·倭人傳》還說那裡“今使譯使通者三十餘國”⁽¹⁰⁶⁾，大概是對一個相對獨立的部落就視作一個國家。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所謂歷經西洋三十多國，也是很小的國，如僅僅一個不大的蘇門答臘島，就計它有舊港、蘇門答臘、黎代、阿魯、南渤里、那姑兒（花面國）等六國；僅僅一處印度半島南部，就計它有小葛蘭（今奎隆）、甘巴里、阿撥拉丹、加異勒、柯枝（今科欽）、古里（今卡利卡特）等六個國家。⁽¹⁰⁷⁾

【註】

-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孟子》下，中華書局，1980年，頁2737。
- (2) 孫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195。
- (3) 江灝等譯註：《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99。
- (4) (8)(9)程俊英：《詩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60-561、550、557註〔3〕、頁150。
- (5)(6)同(2)頁179、頁287。
- (7) 陳可界：〈中國一詞的來源與演變考〉，載《地名知識》，1980年第2期，頁8-9。
- (10)《四書五經》之《中庸》、《禮記》第三十一章，中國書店影印本，1985年，頁14、290。
- (11)(70)《評析本白話三禮》，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2年，頁601。
- (12)(19)(漢)司馬遷：《史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439、頁443、頁411。
- (13)《水經校注》卷三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977。
- (14)(戰國)莊周：《莊子·田子方》，載《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
- (15)(戰國)韓非：《韓非子·孤憤》，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韓非子全譯》。
- (16)(17)(漢)趙曄：《吳越春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36；頁447；頁435。
- (18)《穀梁傳》，載同上《十三經注疏》頁244，昭公。
- (20)(21)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15、頁248。
- (22)臧勵蘇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1933年。
- (23)《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合訂本頁1401。中國。
- (24)來新夏：《林則徐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7。參見梁廷枏《夷氛聞記》、夏燮《中西記事》、李圭《鴉片事略》、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 (25)(26)《中外舊約章匯編》，三聯書店1957年，頁1-6。
- (27)《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一冊頁87。
- (28)《中國人名大辭典》司馬遷、班固：《辭源》史記、漢書；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冊頁122-123。

明太祖實錄

卷六八

四

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
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通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
四夷君長尚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定優給將
為淮安府知府○辛未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
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
與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
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戡

1277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首都南京對國內大臣講話

- (29) 同前《史記》頁815。
- (30) 同前《史記》〈南越尉陀傳〉，頁897-899。
- (31) 同前《史記》頁897。
- (32) 同前《史記》〈東越傳〉，頁901-902。
- (33)(34)(35)(漢)桓寬：《鹽鐵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1、2、5、8；頁94；頁36、103。
- (36) 轉引自(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郡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16。
- (37)(後晉)張昭遠、賈緯等：《舊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三十九，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頁348。
- (38)(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一〇七，列傳三十二，同上影印本頁416-417。原書“屈伏”，經校對延邊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第五卷頁586用“臣服”為通順。
- (39) 韓愈：〈上佛骨表〉，載《全唐文》卷5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40)(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華書局1979年，頁41。
- (41)《宋史·高麗傳》，同前影印本頁1590-1591。
- (42)《四庫全書》：〈小畜集〉卷十四。
- (43) 轉引(康熙)《廣州府志》卷九，〈題共樂亭〉。
- (44)(宋)曾鞏：《曾鞏集》卷三十五〈奏狀〉，中華書局1984年，轉引樂承耀《寧波古代史綱》，寧波出版社1995年，頁157-158。
- (45)《宋史·岳飛傳》，列傳一二四，同前影印本頁1284二欄。
- (46)(元末)王彝：《王常宗集》續補遺，〈泉州兩義士傳〉頁5，載《四庫全書》。
- (47)《元史》卷一百四十。同前影印本。
- (48)《明太祖實錄》卷三七、卷六八；《皇明祖訓》。
- (49)(明)馬歡：《瀛涯勝覽》，海洋出版社2005年。
- (50)(明)鞏珍：《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重版，頁2-10。
- (51)(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華書局1993年，頁320-322。
- (52)(明)羅懋登：《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9。
- (53) 連橫：《台灣通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7。
- (54)(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上冊：〈與陳遭之書〉。
- (55)《中外舊約章彙編》，三聯書店1957年，頁1-2、頁8。
- (56) 轉引王志毅：《中國近代造船史》，海洋出版社頁69。
- (57) 轉引自同(7)。
- (58)(普)陳壽：《三國志·蜀志》，載同前《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頁1177。
- (59) 同上《三國志·吳志》，載同上頁1219。
- (60)(61)《晉書·宣帝紀》，載同上頁1249。
- (62)(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語言》，引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63)《舊五代史》，載同前《二十五史》。
- (64) 轉引《杭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頁78。
- (65)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64-65。
- (66) 同註(25)第三冊，頁46。
- (67) 同註(3)之〈禹貢〉。《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類集成》詩歌卷第四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頁352。第六冊頁555己亥雜詩第124首。
- (68)《毛澤東詩詞》。
- (69) 轉引《漢語大辭典》〈中夏、中華條〉。
- (71)《戰國策·秦一》(漢)劉向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72)《中華古詩文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4。
- (73) 轉引劉迎勝：《絲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4。
- (74) 轉引《中外關係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67-68。
- (75)《牛津英漢雙解辭典》，外研社2002年，p. 176, China。
- (76)《馬可·波羅遊記》中譯本，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頁163：“再一次來到黃河，(……)渡過這條河，便進入富麗的蠻子省。”該書前面提到“契丹”的很多，如頁93講元首都今北京“位於契丹省東北的汗八里”還有頁95、96、97、111、124等等。
- (7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代中書省。地圖出版社1982年。
- (78)《辭海》契丹條釋文，上辭書出版社1980年合訂本。
- (79) 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七冊：〈元代行政區域表〉，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612-642。
- (80)《俄華辭典》，時代出版社1953年頁693。
- (81) 轉引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8-19。
- (82)(西班牙)德·馬達里亞加著，朱倫譯：《哥倫布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297講到哥倫布抵美洲古巴時認識：“土著人稱‘古巴中部’叫古巴納坎。他又一次想到大汗(施按，指元朝皇帝)：(……)它不是西潘戈，而是契丹，是大汗的國土。”“西班牙人(施按，指哥倫布船員)把印第安人當成是大汗的臣民”“哥倫布說：‘我敢肯定這是大陸，我現在就位於泉州或杭州面前’”。頁136：“正好將泉州地角移到了古巴東端，哥倫布認為這裡是亞洲。”
- (83)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118。
- (84) 谷衍龔：《漢字源流字典》。認為從𠂔指從域。
- (85)(86)(87)(88)(89)《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80註〔4〕；頁198；頁210；頁240；頁249。
- (90)(清)沙青巖：《說文大字典》。天津古籍書店1982年卷三頁71。
- (91)(92)《周禮》：天官、冬官，岳麓書社2001年頁429。
- (93)《北京傳統文化便覽》，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頁3。
- (94)(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又立諸侯王國”。
- (95)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
- (96)(日)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華書局1979年，頁91、94。
- (97)(日)木宮泰彥：《日本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84。
- (98) 轉引林士民等：《萬里絲路》，寧波出版社，2002年頁223。
- (99)(100)(101)(102)均見同(91)《周禮》。
- (103) 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中華書局1957年頁268〈相思子〉。
- (104) 六年級語文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頁35。
- (105)《漢書·地理志·燕地》卷二十八下。
- (106)《三國志·總志·倭人傳》。
- (107)(明)費信：《星槎勝覽》；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